

文学十年 风雨路

冯 牧

作家出版社

文学十年风雨路

作者：冯 牧
责任编辑：冯秋子
责任校对：彭卓民 马云燕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10千
印张：14.125 摆页：3
版次：1989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182-2/I·181 (平)
ISBN 7-5063-0183-0/I·182 (精)
定价： 4.50元(平) 8.00元(精)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淨致

冯牧，我国著名的评论家和散文家。一九一九年出生于北京，抗战初期赴延安，开始从事文艺编辑和文艺评论工作。建国后，历任《新观察》、《文艺报》主编。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主编。主要著述有评论集《耕耘文集》、《繁花与草叶》、《激流小集》、《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冯牧文学评论选》和散文集《滇云揽胜记》等。

作家是为了提高和丰富人们的思想境界、使人们变得更美好而写作的，是为了启迪和完善人们的文化素质、审美要求和道德情操而写作的，是为了满足亿万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精神食粮的需求而写作的，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前进而写作的。

——题记

目 录

窄的门和宽广的路（代序）	1
文学的价值在于提高人的思想境界	19
新时期文学的广阔道路	27
凌云健笔任纵横	41
前进与思考——当代文学的重要标志	47
我们的文学向何处前进	52
文学应当关注和拥抱生活	58
短篇小说创作形势喜人	64
关于一九八三年文学评奖答记者问	70
面对现实的召唤	74
文学要和生活一同前进	78
对当前文学创作的期望和展望	87
投身到伟大变革的激流中去	98
作家的社会责任与作品的社会效益	108

不断开拓、不断求索的十年	116
长篇小说丰产带来的信息	122
要重视长篇小说的阵地	129
关于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	134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与样式的报告文学	141
文学和科学应当携手并进	149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教材的编写问题	155
《当代作家论》序	222
《探索者的足迹》序	226
谈文学理论批评工作	231
文谭三题	244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并不后人	261
关于《中国作家》的创刊	266
一本大书——巴金的《随想录》	270
老舍——“文艺界的劳动模范”	273
何其芳的为文和为人	276
炽热的心和锐利的笔	282
重读郭小川诗作	290
《方纪文集》前记	295
愿史铁生健步前进	302
“知识青年”的文学形象	307
从《迷人的海》谈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问题	311
邓刚和他的《阵痛》	319
在没有花环的高山下	324
谈《狗儿爷涅槃》	331
《两代风流》及其它	333

读彭荆风的两篇作品	344
一篇启人深思的佳作	350
谈周政保的文学评论	356
文学应当给生活以报偿	361
时刻倾听时代的心声	367
对生活的追寻和探求	373
震撼人心的历史足音	378
史诗性的作品是必定会出现的	383
从小说和电影的缘分谈起	388
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生力军	393
祖国和人民寄希望于你们	416
我们相聚在金色的秋天	422
后记	441

窄的门和宽广的路

(代序)

时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也时常这样自问：是什么样的因素和原因使我选择了文学这门“行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没有走上另一种工作岗位呢？

老实说，对于这个看来似乎并不复杂的问题，我确实是很难作出简明的回答来，比如，像鲁迅先生在《呐喊》序文中所曾经如此深刻地揭示过的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原因那样。

假如有人从相反的角度提出问题来，我倒是可以不假思考地回答出来。比如：我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工程师、数学家或者地质工作者？我想我一定会这样回答说：因为从上中小学时代起，我就是理工学科上的坏学生。在上中学的时候，我曾经因为数学和理化不及格而留过级。和这一点不无联系的是：我在文科方面的成绩还不错，初中时候就在学校的铅印小报上发表过小散文，高中时期就在小报副刊上刊登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小故事。但是，一直到高中毕业之前，我都没有想过我今后会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更不用说当作家了。

似乎有这样一种说法：在人的心理素质和生理禀赋上，可能有两种（当然不会止于两种）不同的倾向：有的人长于或者倾向于自然科学，而有的人则耽于幻想和倾向于文学艺术。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多大科学根据，但这对于我的生活道路和工作选择的发展趋向来说，倒是基本上相符的。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母亲也是一位时常手不释卷、出身书香门第的有文化的妇女，因此，读书便成为我从小便自然养成的一种习惯。大约在十二三岁，我就读遍了家中所有的从《红楼梦》、《聊斋志异》到梁启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以及别的许多文学作品。大约也是因为这一点，我从此就对学校的理工学科的兴趣越来越淡薄，而对文学作品的兴趣越来越强烈了。我大约还应当感谢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他们引导我从十岁左右的时候就接触了当时的新文学。从那时起，鲁迅的《野草》、周作人的《雨天的书》、冰心的《寄小读者》以及我国早期出版的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如《爱的教育》）便在我的思想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注入了人道主义的甘霖。我在小学和初中的两位语文老师，现在都还健在，都已经八十多岁了。我至今非常感谢他们。他们本身都不是作家，却是我的文学生活中的最早的启蒙老师。

就是这两位善良的、并非文学家的普通教师，在他们青年时代向一个耽于幻想、性情温和而又胸无大志的孩子打开了一扇门——一扇熠熠发光的新文学之门。然而，这扇门，对我来说，正像古老的《圣经》里创造过的一个词，是一扇“窄的

门”。我自以为我将走进这道门，却在门前长久逡巡不前，有好几年的时间不知如何跨进这道狭窄的门，从而走进真正的文学天地。

我的父亲冯承钧是在欧洲的法国和比利时完成他的学业并且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他是一个具有中国人的正直、善良、诚挚的传统美德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很严肃的，有时甚至到了严厉的程度，然而对于子女教育的主张，却是一种西方的民主精神。他希望孩子们勤学向上，正直做人，至于孩子们将来要走什么道路，他却是相当宽厚，从不硬性做出强加于人的规定的。他曾经希望他的五个儿子都读完大学，至少其中有一两个人能把他的事业继承下来；后来多少做到了这一点的是我的大哥冯先恕和最小的弟弟冯先铭。前者是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很器重的学生，但不幸在三十岁时便夭亡了；后者后来则成为一个在陶瓷史上颇有造诣的学者。我父亲曾希望我成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并且劝我在上大学时报考植物系（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种怪念头），但后来看到我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低能，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他曾经偶然看到我写的一篇散文和翻译的一篇小故事，我从他状似首肯的表情上看，感到他对于我在十四五岁时便达到了文字清通的程度是很满意的，不过他从不形诸于色，只是以后再也不曾因为我在数理化课程上考不及格而责备我了。

我的父亲在中年时期便患了一种神经系统的病，长期处于半瘫痪状态，很难执笔作书，这对于一个靠著作和学术研究为生的人是很艰难的，也是很痛苦的。他出版的许多著作，都是靠他口述，由孩子们用笔记录下来，再由他修改而定稿成书的。这个任务，在很多时候便落在我和大哥的身上。我至今还记得

我用笔记录他译注的《马可波罗行纪》时候的情景。在他面前堆满了这本著作的原文本和法文、英文、日文译本。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这样一页一页写下去。老实说，当我一页一页地记录着这本著作时，我对它其实是没有多少理解和兴趣的，但是，我逐渐感到，在把我父亲口述的语言转成书面文字时，我做得越来越熟练和得心应手了。我也感觉到父亲对这一点似乎很满意，因而他后来要我帮他记录译文的时间越来越多了。当时，我曾经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多少影响和妨碍了我个人爱好活动的负担，然而，后来，当我开始有些自觉地想要在文学和文字表达能力上下些功夫的时候，我突然醒悟到，我过去认为是额外负担的事情，其实是一件对我大有好处的事情；至少，在那以后，当我在学习阅读中国古典文学时，中国的古代诗文对我似乎变得不那么困难了。我逐渐学会了用通畅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见闻的初步能力。

上面讲到的一切，能够成为我后来何以走上文学道路的一种合理的回答和解释么？我想事情未必如此简单。但是，有一点却无疑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一个人的文化教养以及他少年时期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氛围，对于他后来能不能够成为作家，决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

二

读书帮助我认识了文学，接近了文学，但是，真正使我下决心和有勇气跨进文学的那座“窄的门”的，却不是读书，而是生活。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我在这座文化古城接受了我的文化教养，一直到十八岁高中毕业。在三十年代初期，在

我的记忆里，北京（那时叫北平）是一座幽静的、朴实的、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但是，在我开始懂事并且努力理解生活的时候，我却发现：这座有着非凡的古典美的魅力的城市，好像正匍匐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在这座安静、美丽的古城中，出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郁闷的气氛。时代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兴亡问题提到了每一个人的面前，并且装进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我所活动的以青少年为主的社会圈子里，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衡量一个人的品德情操的主要标志。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之中，我很自然地投入了当时在北京兴起的波涛汹涌般的爱国学生运动。也可以这样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促使我、推动我在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关键时刻，向着我后来决心终身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跨跃了一大步，也向着我自以为和自己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文学事业跨跃了一大步。这主要表现在：直到此刻，我才开始明白了文学还有新旧文学之分，还有进步的、革命的文学和其它种种文学之分。文学，原来是同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密切连接在一起的一种崇高的精神活动。

我有了一点点进步，但还不能说我已经真正跨进了文学路上的那座“窄的门”。因此，我虽然热衷于文学，却还没有立志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也不知怎样才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

在“一二·九”运动的行列里，我可以算得上是个积极分子，但无论从思想觉悟或者理论修养来看，我那时还只是个很幼稚的热血少年。我在北京几乎参加了从“一二·九”开始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受过国民党军警的水龙头和棍棒的冲击，并且在一九三六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开始懂得了文学并不只是一种可以给人以精神感染的美的享受，并且开始懂

得了：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兴趣和精力，逐渐从对于屠格涅夫、哈代的长篇小说和何其芳的散文的迷恋，转入到“民先”和同学间组织的读书会的活动上来。这些读书会的活动，回想起来有点像是解放以后的“读书班”。我们热忱地阅读的书，不但有上海出版的进步书刊，而且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显然是从地下党那里秘密传送过来的关于中国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油印小册子。我们也经常举行学习讨论会，大家谈论得比较多的，是如何参加实际的抗日活动以及一旦北京沦陷以后我们应当怎么办的问题。

“七七”事变以后，我的伙伴们大部分都在地下党的组织下撤退到大后方去了，而我却偏偏在这时患上了很严重的结核性肋膜炎，不得不滞留在沦陷的北京城。“民先”的伙伴中也有几个人没有来得及撤离北京，于是，我们就组织了另外的“读书会”。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的危险，我们的读书活动带上了更为浓厚的文学色彩。在半年多当中，我读了许多中国和外国的文学作品，并且开始自觉地学习写作。我没有想到写出来的东西将会产生怎样的作用，不过，我在勤恳学习的时候，在心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念头：一旦我能逃出北京到解放区去，我所能做的事情，恐怕就只有靠这支笔了。如果可能，我一定要通过写作，来把拥塞在我心中的对于祖国的爱和对于敌人的恨倾吐出来。

只是在这时，我才可以说，我在文学之路上开始起步，而且比较认真地考虑如何才能跨进那座文学的“窄的门”，走上真正的文学之路。

三

三八年春天，我终于逃离北京，通过“民先”的安排来到冀中解放区。我渴望从事文学工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志愿都未能实现。我用绝对真诚的感情写了一些短诗和散文，但看过的人却说：我的文字很流畅，但从这些诗文当中还看不出我能够成为一个作家的迹象！这些评语和我的中小学老师对我的作文所作的评语差不多。

就在我几乎要丧失了对于从事文学工作的信心的时候，我和一些青年一道被送到延安去学习。我开始体验我过去从未经历过的生。我们长时间地在根据地之间长途行军，使我领略了实际的战士生活和书本上描写的战士生活之间的差别。我学会了背着背包夜行军和过封锁线，学会了上山砍柴和在野营做饭，学会了忍饥耐渴和适应各种各样过去从未想像过的艰苦生活；我自己觉得自己几乎变了一个人。但是，有一天我却无意中偷听到了一个老战士（我的同行伙伴）对我的“评语”：“这是一个典型的忧郁型的小资产阶级！”

由此，我深深地体验到：要想把自己塑造成符合自己理想的人，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自己仍然不想放弃我的志愿；我顽强地认为，除了搞文学以外，恐怕没有适合我做的工作。到了延安以后，我和一个北京同学一道去报考鲁艺：他报考音乐系，高高地考中了；我报考文学系，却名落孙山。这时，我才懊丧地领悟到：要跨进文学的“窄的门”，光靠热情的愿望，而没有刻苦不懈的追求，恐怕是不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执拗地认定：我也许没有足够的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但是我就不相信自己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在

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是用心地阅读找得到的一切文学书籍，几乎每天都试着用自己以为优美的文字把自己的思想记下来。我的固执没有白费。不久以后，我终于在另一次报考中考上了鲁艺文学系，而且被认为是这一批考生当中水平很不错的。当时的主考是何其芳同志，他向我提问了几个关于文学的知识性问题，我照我的理解回答了。然后是笔试：要我在一个小时内写出一篇人物速写来。恰巧我刚刚读过法国纪德写过的一篇散文《描写自己》，我也就写了一篇一千字的题名为《自画像》的散文。我完全没有想到，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显然还很幼稚的文章居然大为赞赏，他拍着我的肩膀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行了，你考上了。你的题目选得好，以后的考生的作文就都用这个题目。”

那时，我简直有一种近于幸福的感觉。我当时把鲁艺文学系看成是一座文学殿堂，以为一旦考上了就可以一步跨进文学的门坎。我下定决心勤奋读书，来补偿一下由于抗战爆发而丧失了的上大学的机会。在人们眼光里鲁艺是一座正规的艺术大学，而那时我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才上大学，太晚了！

我在鲁艺学习和工作了四年，这四年的生活和学习，至今仍然时常引起我的甜蜜的回忆。我从当时主持鲁艺文学系或者讲过课的前辈作家，如茅盾、周扬、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等同志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教益。从四〇年起，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诗文，那多半是学习中的作业，由何其芳同志挑选出来寄到大后方报刊上发表的。也是从这时起，我兴趣从诗歌、散文转到了评论方面来。我着迷似地阅读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那时鲁艺虽然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小图书馆，但是想要借到想看的书籍却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于是，我们就采取抄写和摘录的办法，把一些自己喜爱的作品抄在本子上，

这是一个笨拙的但却常常是效果昭著的办法。因此，我与同学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几本自己手抄的世界名作，以备朝夕讽诵之用。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这样说：直到这时，我才勉强地跨进了文学事业的“窄的门”。我所以要不太确切地借用《圣经》上的这个典故，无非是想借此表明：一个人想要走上文学之路，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需要有足够的文化准备和孜孜不倦的实践和追求；他需要有坚强的信念，而这个信念，只有同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进程相吻合、只有与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相结合的时候，才能成为促使一个人在文学之路上迈步前进的动力。

我所以认为直到这时我才算开始跨进了文学之门，还因为：在鲁艺生活和学习的四年，除了使我获得了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当具备的文化知识素养以外，还使我明白了，在跨进文学之门以后，还有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如何进一步确立一个进门之后的前进道路问题。这就是说，我已经跨进了对我来说原来是高不可攀的那座“窄的门”，但接着要我回答、要我选择的是：究竟什么样的道路，才是一条宽广的正确的文学之路。有人也许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但在那个年代里，这却是一个需要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在鲁艺的四年间，我读过各式各样的书，听过许多观点各不相同的课程，迷恋过许多不同流派作家的作品。我曾经十分起劲地研读过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瓦勒里、马拉美的诗，也非常真诚地为惠特曼和玛雅可夫斯基的作品所激动。而有一个时期，我则认真地阅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马、恩、列以及高尔基和鲁迅关于文艺的理论著述。在这段期间，我也参加许多过去从未参加过的体力劳动和生活体验：我开过荒，纺过线，到工厂和农村访问